



王永治等编

国民经济管理概论

参考资料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参考资料

王永治 等编

*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装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千字 253

1986年4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

定价 1.65 元

ISBN7-304-00037-6/F·5

选 编 说 明

为了帮助学员学习《国民经济管理概论》这门课程的内容，我们选编了这份学习资料，供大家学习时参考。

在学习中，应以教材为主，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根据教师讲授的体系和重点来掌握课程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再适当学习一些资料，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由于教学要求的限制，我们只选编了有关国民经济管理的一部分资料。加上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全和水平所限，有可能把一些更好的文章选漏了，选编的资料不一定能满足全体学员的学习要求。学员还可根据教学要求以及各人的具体情况，自行选读其他资料。

在学习中，希望学员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控制、搞活微观经济等规定、讲话，以这些文件、讲话为指导，学好《国民经济管理概论》。

对于本资料选编中的缺点和错误，敬希批评指正。

王永治 林顺宝 金碧华

、1986年3月

目 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瞻望.....	薛暮桥 (1)
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是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方针的理论依据.....	马 洪 (11)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讨论.....	(22)
两种调节机制的有机结合.....	马家驹 (25)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几个问题	王爱珠 (31)
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理论在我国的发展.....	王积业 (46)
论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控制.....	林子力 (61)
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与行业协会.....	蒋一苇 (71)
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企业 的关系.....	晓 亮 (80)
浅谈厂长身份的问题.....	韩岫岚 (93)
关于研究制定我国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马 洪 (96)
我国总体发展战略研究的新起点.....	吕振茂 (101)
走向二〇〇〇年的中国.....	马 洪 (106)
中央对外开放的决策符合实际大得人心 ——国务委员谷牧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上的报告.....	(116)

建国以来我国劳动者在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中的构成及其变化情况·····	余 华 (126)
论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	桂世镛 (133)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在调节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	刘鸿儒 (146)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	
(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国务院发布)·····	(155)
加速技术改造 提高经济效益·····	董绍华 (166)
坚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	许 毅 陈宝森 (179)
关于加强行业管理的探讨·····	陈佳贵 邱靖基 (186)
对我国生产力布局战略的探讨·····	陈栋生 (199)
指导性计划探讨·····	吴俊扬 (225)
如何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	孙效良 (237)
第三次全国中心城市经济理论讨论会纪要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一日)·····	(253)
我国沿海十四城市开放后对深圳地位的	
再认识·····	余国耀 (264)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	
的规定(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布)·····	(275)
国务院发出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	(283)
当前改革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建立开放的社会	
主义市场·····	魏 杰 (287)
贸易中心与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	徐惠蓉 (297)
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资金市场·····	沈立人 (303)
劳动力市场和它的调节机制·····	孙 浩 (313)
技术商品 技术市场 专利制度·····	黄小蕙 (315)
谈谈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	薛暮桥 (327)

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税收工作·····田纪云 (340)	
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发布)····· (349)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瞻望

薛 暮 桥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已经七年了，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的改革首先在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农村中进行，为把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的生产潜力充分发掘出来，我们大胆地打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模式，推行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奖励多种经营的专业户，发展多行业的乡镇企业，适应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在商业方面打破供销合作社的独家经营，改变为全民、集体、个体多渠道经营，扩大市场商品交换。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说已经取得根本的突破，正在继续向商品化、专业化、科学化的方向蓬勃发展。今后的任务是要因地制宜搞好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继续巩固地方和乡村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采取间接调节方法继续加强国家对农村经济的计划管理。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情况复杂，起步比较慢一点。改革的中心是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使它从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转变到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种改革，牵涉到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商业和物资流通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和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难度比较大。对上述各方面的改革

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都还处于过渡阶段，没有基本完成，相互之间的配合也还不够完善，所以除极少数经营管理比较好的试点企业外，都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现在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大体上放活，它们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几千个大中型国有企业。这几千个大中型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如果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僵化状态，那么不但发展相对迟缓，且有可能削弱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骨干作用。所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经济工作的重点从调整转向改革，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中心是把这几千个国有企业也变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真正能够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放快了，开始出现生动活泼的新局面。去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少有的，也是我国除建国初三年恢复时期和五十年代末的三年“大跃进”（这次“大跃进”引起工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外历史上少有的。虽然物价上升多一点，但人民生活仍然有显著的改善。工业生产的超高速发展是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基本建设规模失控（原因是银行信贷失控）和工资基金失控所引起的，它一方面产生国民经济的空前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使经过几年调整，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缓和，消费品供应相当充足（这是放手进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的局面有可能得而复失，给今后的体制改革造成困难。所以从1985年第一季度开始，国务院召开了几次省长会议，坚决把这种失调的现象扭转过来，到1985年第三季度开始取得初步的效果。鉴于1981年急刹车的经验，去年我们采取慢刹车的办法，努力使全年的信贷不超过原定计划，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尽可能不超过1985年的规模，以防止已经基本上协调的

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再一次出现不协调，被迫再来一次调整。

回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要求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79年由于建设项目已经开工，原定压缩投资的计划没有完成。1980年计划内的投资压下来了，但因改革财政和金融管理体制，利用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信贷进行的计划外的投资大大增加，又突破了国家的原定计划。1981年第一季度实行急刹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突然下降，重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虽然第二季度开始逐步放松银行信贷，这一年基本建设投资没有突破国家计划，工业生产只稍稍超过国家计划（4.5%），是近七年最低的。这一次急刹车，付出了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特别是重工业生产下降这个相当大的代价。但换来了1982年生产资料供求大体平衡，许多种消费品出现买方市场，为以后的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82年到1984年第三季度，虽然基本建设规模又突破国家计划，工资和奖金的增长也比较快一点，但因工农业生产的增长远超过国家计划，生产资料还不很紧张，市场商品供应十分充足，粮食、棉布等人民生活最必需的消费品出现过剩，要向国外推销。所以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是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有利的时机，决定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个决定是及时的，完全正确的。

1984年第四季度着手银行信贷制度和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扩大地方、企业利用银行信贷进行建设的自主权和企业进行工资改革的自主权。由于缺乏经验，在微观放活的同时没有相应地加强宏观控制，出现了银行信贷和工资基金两个失控。第四季度银行信贷猛增，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64%左右，工资总额1984年第四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30%以上，奖金等比上年同期增长100%以上，远远超过工农业生产的增

长速度，货币发行急增(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丰收，收购额大幅度增长所致)，外汇储备下降。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几次召开省长会议，纠正生产和建设中的这种“过热”现象。当然，建设项目的压缩要有一个过程，已增加的工资难于下降，且因进行工资制度的改革去年还不能不继续有所增加。去年生产资料的供应又出现过分紧张的现象，钢材等生产资料的议购议销价格剧涨。消费品供应虽然还没有出现紧张情况，但因购买力增加过快，市场商品价格上涨较多，某些产品且因过分畅销而质量下降。解决办法除加强市场管理外，根本办法在于控制购买力(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今后两年，我们应当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加强宏观控制方面，随着宏观控制的加强而把微观经济(特别是对几千个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进一步放活。

有些同志用旧眼光来观察新问题，认为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一年我们的改革要求过急。他们把生产资料的涨价说成是实行议购议销政策的结果，主张恢复生产资料的统一分配制度。三十多年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是生产资料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过去基本建设投资都靠财政拨款，生产资料统一分配还比较容易(但也出现众所周知的种种弊病)。现在依靠财政拨款的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已经只占三分之一，依靠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自有资金建设的计划外的基建已占三分之二。如果恢复过去生产资料的全部统一分配，取消议购议销，大部分计划外的建设和地方中小工厂的生产都要陷于瘫痪状态，由此带来的损失将是无法估计的。煤炭是最早实行议购议销的，前两年由于计划外的煤炭供应增加，议价稍有回落。现在供应最紧张的是钢材，但因大家抢购贮存，层层积压最严重的也是钢材。统一分配不能

增加钢材的供应(且可能引起地方小钢材厂的生产减少),只有普遍建立钢材交易市场,货畅其流,吸引库存积压的钢材流到市场里去,才能使钢材供应比较缓和,使议价不致继续上涨甚至略有回落。当然,使钢材议价下降的根本办法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81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使这一年和1982年钢材进口显著减少,库存积压钢材显著下降。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钢材的价格才能趋向稳定。

去年国家主动放开副食品的价格,实行国营商业参与下的市场调节,这是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胆的尝试。许多外国专家都指出能否调整不合理的物价,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根据东欧各国改革的经验,在物价改革中风险最大的是放开副食品的价格,一放开价格就上升一倍到两三倍,引起社会震动。我国在这方面动手较早,1979年就主动调整副食品的价格,对这一次放开后副食品价格的上升,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1979年和1985年国家两次把副食品涨价的金额发给职工,并且还提高了职工工资,因此就防止了绝大多数城市人民因副食品涨价而降低生活水平。放开价格的结果使副食品的供应显著增加,今后几年还会继续增加,供应的增加乃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根本的保证。由于副食品提价和某些日用百货因购买力剧增而价格有所上升,1985年物价的总水平上升9%,大中城市上升幅度更高一些。这在我国是少见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有经验的外国专家都认为,能够顺利地放开副食品价格,这是我国改革中取得的一个可喜的成果。

1985年我国除物价改革外还实行工资制度的改革,使多年来职务提升、担负重大责任而工资没有相应地上升的职工的工资较大幅度地上升,使我国的工资制度从多年来的平均

主义开始走上按劳分配的轨道。由于1984年工资基金失控，1985年必须避免工资基金的过度膨胀，所以同物价改革一样，只是部分的改革，并没有完全达到合理的程度。物价和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肌体上的两个“病灶”，它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去年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今后进一步的改革开辟了道路。1984年银行信贷和工资基金的两个失控，给1985年这两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物价管理体制的改革造成一些障碍，否则我们的步子还可以跨得更大一点。今后两年我们应当努力改善宏观控制，完善已经实行的改革措施，使国民经济继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为进一步深入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

几年来我们不但把农村经济放活。而且把城市集体经济和相当大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放活了。但是作为国民经济骨干的几千个大中型国有企业，大部分还是困难重重，它们的发展速度显著地低于城市集体经济，更低于乡村集体经济。目前城乡集体和个体经济发展很快，这是可喜的，是近几年城乡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果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是不利于巩固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的。解决办法不是把集体、个体经济的手脚捆起来，而是把国有企业的手脚放开。国有企业不论在资金上、机器设备上、技术管理人员上，都远远超过集体、个体经济。只要给它们以必要的自主权，它们是有充分力量来同集体、个体经济竞争，以大体上同样的速度同步前进的。这不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起重大的作用，而且对巩固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也起重要作用，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决策。

进一步推动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我

认为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进一步完善计划、财政、金融、物资、价格、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使它们互相配套，保证大中型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计划能够顺利实现。现在我们在计划方面，应下放的权力已在逐步下放，但与此同时，其它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很好配合。财政在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后，由于价格等还没有完成调整，还不能不利用过多的调节税来减少不合理的苦乐不均现象，以致仍难免鞭打快牛。现在是国有企业征重税，集体特别是乡镇企业征轻税，个体经济事实上绝大部分基本上没有征税，这是几千个大中型国有企业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物资管理上依然重行政分配，轻市场交换，计划调拨和议购议销两种价格差距过大，没有广泛建立生产资料交换市场来方便物资流通。部分投资、外汇和大部分调拨物资仍由中央有关部门掌握，在把企业的自主权下放的时候，地方和企业因怕分不到必要的投资、外汇和调拨物资而不敢接受，愿意继续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物价和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由于两个失控而不能不放慢步伐，反过来又阻碍国有经济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对上述这些问题，需要加强研究，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

第二，我们在把微观经济搞活以后，由于经验不足，没有相应地加强宏观控制。过去我们的宏观控制主要靠计划和财政，实行体制改革以后，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已有三分之二靠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的自有资金(也要通过银行)，银行成为宏观控制的最重要的工具。我们设立中央银行，目的是在控制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防止通货膨胀。由于中央银行还不健全，1984年第四季度各专业银行竞相扩大信贷。这些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基本建设，1985年开始紧缩信贷，使许多

企业缺乏流动资金，陷入困境。所以我们不能采取急刹车的办法，除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外，仍然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正常运行。中央要求今后两年继续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对消费基金的增长也进行适当的控制，以免再一次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努力改善和健全宏观控制的手段和方法。

党的十二大提出二十年工农业生产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并指出前十年速度低一点，为后十年的经济振兴打好基础。前四年我们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8%上下，工业生产超过10%，显著地高于二十年翻两番所要求的增长速度(7.2%)。由于宏观失控，1985年前三个季度工业生产增长20%以上，东南沿海地区乡镇工业1984年增长30-50%，1985年还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西部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坐立不安，想同东部地区攀比。应该认识，这种“过热”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应当逐步地把“超高速增长”降落到正常的增长速度。

第三，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一点，还应当指出我们的经济管理干部(从中央、地方到企业)素质不高，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个基本国策不相适应。许多地区、部门、企业要求把自己的发展搞得更快一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综合起来，总需求就超过了总供应，这个主观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还会带来经济秩序的一定程度的混乱，这一点今后应当广泛进行宣传教育。过去我们许多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干部习惯于吃“大锅饭”，不愿意冒风险去创新。现在换了一批年轻的干部，闯劲是比较大了，但也可能有一些人由于缺乏经验，蛮干瞎干，经营失败以后仍然只能由国家来负担损失，所谓“自负盈亏”，实际上是只负盈、不负亏。还有一些干部获得自主

权后不努力改革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向外开拓产品市场，而是钻财政上的空子，损公肥私，或者乱提价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所以从长期来看，要全面完成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必须努力提高各级经济工作干部的素质，当然这不是一两年就做得到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止步不前，要在加紧干部选拔培训的同时，让他们到大海中去学习游泳，领导机关及时给以正确的指导。

由于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必然要面临许多困难，因此有极少数同志对最近一年来的改革发生怀疑，个别同志甚至认为我们的改革失败了。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国外也有许多议论，总的来说他们比较乐观。1985年9月上旬，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世界银行合作，邀请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在长江三峡“巴山号”游船上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会前赵紫阳总理亲切会见各国专家学者，十分坦率地向他们介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为这次会议作出良好的开端。在一星期讨论中，各国专家、学者一致赞扬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一致认为最近出现的经济困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时期中难免要产生的，几乎所有的国家在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期内都经历过这样的困难。他们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中总是存在着导向“过热”的倾向，在国家经济的各个层次都有“投资饥饿”。这样的倾向又常因计划中增长目标订得过高而加剧，结果常常出现促成通货膨胀的压力、物资短缺以及增长不平衡。在处理当前局势时，应当看到造成“过热”的基本原因。还应该注意，一些行政措施尽管在短期内难以避免，但不要使它们妨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进步。

十个来自不同制度国家，在各国甚至世界上有权威的学者，他们虽然经历和体验各不相同，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却具有基本上一致的看法，这可以说是这次讨论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更坦率地承认他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比我们要严重得多，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动摇他们改革的决心。西方国家除美国外战后都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物资短缺，也曾经采取过配给、补贴以及类似的行政管理办法，因而对取消这些行政管理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有切身的体会。

各国学者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管理、财政政策、工资控制、货币和信贷的控制、金融市场等方面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值得我们参考。通过这次会议，与会的中国学者更增强了对我国体制改革的信心，很可能使各国学者对中国的体制改革也增强了信心。

道路是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经济日报》1986年1月25日）

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对内搞活、 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依据

马 洪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是在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行政领导机关、按行政区划和行政层次组织起来、主要采用行政命令调节方法的经济体制中运行的。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在计划上大包大揽，在流通中统购统销，在劳动上统包统配，在购征上统收统支。“统”字是这种体制的一个基本特色。这种体制把整个国民经济管得很死，窒息了企业活力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必不可免地阻碍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但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体制呢？这是与我们在理论上长期未能摆脱自然经济论的影响，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截然对立起来，有直接关系。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只能按行政原则组织国民经济，用行政命令把企业的手脚捆得死死的，从而带来上述弊端。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多年来，每当我们发现某种产品短缺，而加强计划、控制的时候，这种产品就越控越死，越死越少；也就是说，我们越是强调加强所谓计划管理，严格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时候，计划经济碰到的困难就越多；而每当我们放宽对发展